



中山大学985工程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丛书

● 主 编 王 珺

产业集群与中小企业融资机制

——基于广东产业集群的制度分析

赵 祥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山大学985工程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丛书

产业集群与中小企业融资机制

——基于广东产业集群的制度分析

赵祥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产业集群与中小企业融资机制：基于广东产业集群的制度分析 / 赵祥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6
(中山大学 985 工程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基地丛书)

ISBN 978 -7 - 5058 -7063 -5

I. 产… II. 赵… III. 中小企业—融资—研究—广东省
IV. F279.2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6503 号

责任编辑：文远怀 党立军

责任校对：张长松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王世伟

产业集群与中小企业融资机制

——基于广东产业集群的制度分析

赵祥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欣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永胜装订厂装订

787×1092 16开 13.75印张 260000字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58-7063-5/F·6314 定价：24.00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在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的进程中，生产网络本土化也成为发展的趋势。这种看似矛盾却存在着内在联系的两个趋势是由不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差异决定的。全球化经济活动建立在可易于流动的生产要素基础上，诸如资本、编码知识与技术、信息与外汇等。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易于流动的，诸如劳动力受到地域文化的限制而使其流动性远远低于资本的可流动性，因而劳动力市场往往被认为具有相对空间稳定性和相对不可移动性，从而具有明显的地方性 [马丁 (Martin), 1999]。当易于流动的资本追逐不易于流动的劳动力时，就可能形成不同资源的区域性结合，这就自然产生了基于国际化网络联系的生产本土化。至于易于流动的资本与哪里的不易于流动的劳动力进行有效的结合，这主要取决于不同地区在产业组织、区位以及劳动力素质等方面的差异。所以，运输技术与通信技术 etc 被英国学者迪肯 (Dicken, 2003) 称为“空间压缩”的技术进步虽然使得整个世界变小，但并没有使地理概念终结和距离概念死亡。任何一种生产网络都根植于一定的区位内，这使得人们在密切注视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对生产网络本土化给予了同等程度的关注。这就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产网络本土化构建与发展也方兴未艾的原因所在。自皮奥里和萨贝尔 (Piore and Sabel, 1984) 的书问世以来，人们开始从福特式的大规模与标准化生产方式与小批量、定制式的柔性专业化生产体系之间的差异性寻找地域性生产体系与

经济全球化过程并存的内在原因。比如说，欧洲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传统产业的集群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产业领域所具有的灵活专业化、小批量与定制式生产方式是大企业所不具备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学者波特（M. Porter, 1990）提出国家与地区竞争力的钻石理论，阐述了产业集群的优势所在。美国学者萨克斯宁（Saxenian, 1994）在《地区优势：对美国硅谷与128公路的比较》一书中解释了硅谷作为一种根植于结构与文化网络中的地区之所以优于美国麻省128公路的内在机制；布鲁斯科（Brusco, 1990）和比克提尼（Becattini, 1990）等意大利学者总结了意大利北部地区基于中小企业的集群化发展的成功经验，从而被称为“第三意大利”模式。随后，许多学者采用了这种研究集群的理论工具对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日本和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巴西、斯里兰卡、印度、越南、泰国等发展中国家不同地区产业集群化发展展开了案例性的研究，为这些国家有效地制定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虽然各省份的支撑产业、企业的经济性质、政府以及市场作用程度都不完全相同，但是有两点是基本相同的。一是民营经济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相比较而言，凡是民营企业发展比较好、民营经济规模较大的地区，其就业是比较充分的，收入增长是比较快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化程度也是比较低的。浙江与福建经济的较快发展印证了这一点。二是产业集群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考察我国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集群化发展成为我国地区之间拉开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995~2005年期间，凡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都是产业集群数量较多的地区。从我国各地区产业集群的分布来看，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产业集群最密集的地区，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这种较高的相关性并不是偶然的。如果把经济发展程度看成是因变量的话，那么，集群就是一个相关性较大的自变量。事实上，这两个共同点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大量分散的民营企业是通过集群化发展来抵御外部市场与制度变革中不确定性的，所以，凡是产业集群数量较多的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是比较好的。正因为如此，现阶段我国各级政府都认识到一个地区有没有集群、有多少集群对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而把产业集群作为促进民

营企业、特色产业与地区规划的一项强有力的推动手段。

企业与地区经济发展对集群实践的需求促进了集群理论的深化。从马歇尔 (Marshall, 1921) 提出的产业区理论到现阶段强调互动式学习的创新区理论的近一个世纪里, 人们在不断地深化着对这种基于地域性集聚行为的理解。除了把生命周期理论、分类方法和经济学中的分工与交易理论以及交易费用理论应用于集群的经济分析之外, 学者们还主要沿着马歇尔的分析路径, 把外部性看成是解释地区集聚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外部性涉及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信任、共享资源以及提供专用技能的劳动力市场等, 具有明显的外溢性。马歇尔把这种外溢性概括为投入分享、劳动力蓄水池和知识外溢三个方面。然而, 这种对产业区的分析往往停留在自然禀赋与经济活动的层面上。与这种分析不同, 意大利学者比克提尼 (Becgttini, 1990) 把马歇尔的产业区看成是一个社会经济体系, 其研究特点是强调了格兰诺维特 (Granovetter, 1985) 的嵌入性概念, 即企业的集聚行为嵌入于当地的文化、社会制度之中。这种嵌入性决定着这个区域内的企业之间相互信任与非贸易的相互依赖等。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知识经济时代, 人们进一步挖掘着集群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可行性。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流动与学习过程得到更多的重视与强调, 而集群被认为是适合缄默性知识流动和面对面学习的最好场所, 这是由集群有利于知识溢出所决定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集群又被看成是一个学习和创新区。

不可否认, 现阶段人们对集群知识的了解还是十分有限的。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对现有的集群概念、形成机制与发展过程以及经济影响的认识不足。另一方面表现在本地政府作用、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以及本地化与全球化之间联系方面集群环境与非集群环境之间的差异性问题上。这里仅以集群定义为例, 到目前为止, 集群定义依然存在着较多的混乱。比如说, 美国哈佛商学院波特教授 (1998) 根据经济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特征给出了集群的定义, 而布鲁思科 (1990) 则根据意大利北部中小企业实践把集群看成是相互关联与合作的中小企业聚集。一些学者 (Swann and Prevezer, 1996) 把集群限定为一群企业在一个地域内围绕着一个产业的聚集。也有一些学者 (Roelandt and Hertog, 1999) 把集群当成是一种相互依赖的生产商之间以及供应商与采购商之间围绕着价值链形成的网络。还有一些人 (Simmie and Sennett, 1999) 从创新网络角度限定集群含义。显

然，不同的学者是根据集群所处的不同阶段给出定义的，同时，学者们也根据自己所观察的集群要素、部门以及相互联系的复杂程度指出了集群的不同内涵。此外，还有许多学者根据本国或本地区的企业聚集实践给出一些特殊的称谓，诸如专业产品区、专业区、专业镇、企业集群以及产业集群等。这说明，集群仅仅是人们对一群企业在一个地域内围绕着一个产业的聚集现象进行的一种简单描述，远没有达到相互认同的程度。在诸如集群形成机制、发展特征与演变过程等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之所以人们对集群的描述与解释没有像经济学中的其他理论一样自马歇尔之后得到明显的推进，之所以研究集群的文章进入主流经济学杂志的数量较少，我认为，这主要与研究集群的数据来源相关。比如说，产业研究有正式的国际分类标准，研究产业的学者可以依据国际上的分类与标准以及各国据此公布的数据，进行系统的研究，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学者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进行不同地区、国别与阶段的比较研究，然而，集群则缺乏这种类似产业的分类规范，因而也没有可比较的系统数据，数据只能来自每个学者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直接调查，而调查的结果千差万别，这就影响到数据的比较与归纳。目前，人们对这种地域性集聚现象的概念认识之所以都存在着较大分歧，不能说不与集群这种缺乏系统数据的现象以及人们对这种现象的分析有限相关。也恰恰因为从某一个学科对这种地域性企业聚集现象解释的有限性，使其成为诸如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地理学以及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综合性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案例分析与比较研究基本上是这个学术领域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工具。

在先走一步的广东经济发展中，我们把企业围绕着某一个产业形成的明显的地域性集聚称为专业镇，而没有称为学界统一使用的产业集群概念，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在我国各级政府对本地区经济与资源动员与配置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体制下，把每个地方政府的作为边界界定清楚，有利于激励本地政府对所辖范围内的企业集聚进行公共性或准公共性的建设与管理。无疑，这种建设性投入与治理对于企业的有效聚集十分重要，而且也需要找到一个行为主体。在一些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往往是行业协会或商会充当这样的行为主体，由于商会的运作往往以会员制为主，因而行政地域性一般会被淡化。在我国市场取向的经济转轨过程中，商会或行业协会没有发育起来，但是现实经济中不能没有行使这种角色的行为主体，而各级地方政府又具有这种能力，这就形成了我国由各级地方政府

充当这种行为角色的体制性原因。而一旦地方政府充当了这种角色，它与商会或行业协会的差异也会表现出来，那就是需要事先确定各级地方政府管辖的行政边界。这种界定像经济主体的产权界定一样，不仅具有获得收益的激励性，也有与其他主体抗衡的竞争性，从而具有会激励地方政府产生很强的服务本地集聚的动力。因此，虽然专业镇不是一个学理性概念，但是，在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中，专业镇会比产业集群更有利于调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以专业镇为单位进行数据统计。比如说，到2007年，广东省专业镇已达到200多个，工业产值占了全省的20%左右。当然，这仅仅是企业聚集的初期形态特征，随着企业聚集规模的扩大，专业镇往往难以容纳越来越多的企业集聚，这就会超出原有的边界，更大范围的产业区就可能出现。

从理论上总结与考察广东经济专业镇的发展实践，不仅是因为我们身处岭南，便于调查，比较熟悉广东经济活动的产业分布、行为方式和交易特征等以及在这个领域有一定的研究积累，更重要的是，相比较而言，广东专业镇具有四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广泛性。在广东行政地域内，从经济比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到粤东西两翼以及粤北山区等，都分布着众多的专业镇，在这些专业镇中，从皮革、陶瓷、纺织、制鞋、玉器、毛纺、家具、五金、建材、家用电器等轻纺工业到汽车配件、石化生产、钢铁制造等重化工业，其专业镇的产业集聚是十分广泛的。二是多样性。这不仅体现在专业镇的产品种类上，而且也表现为形成机制上，这是其他地区所不能同时具备的。比如说，有些专业镇是通过外资引入而聚集起来的，类似东莞的清溪镇、长安等；有些专业镇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演变，几经兴衰而形成了现阶段产业与文化合为一体的风格，诸如南海西樵镇等；大部分专业镇是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大城市周边地区而聚集成型的，诸如中山小榄镇、江门水口镇等。这种多样化的形成机制对整个产业集群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三是可持续性。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往往是理解持续性的基本理论工具。广东大部分专业镇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兴起和发展的，到目前为止，也都经过了20~30年的时间。随着产品的需求结构的变化与对产品的更新换代，产业集群的产品种类与竞争机制也发生着变化，这包括了原有产业的地域性转移和原有地区的产业置换两个方面。研究这两个方面的内在机理对于认识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的一般性以及特殊性是十分重要的。四是前瞻性。相对一般的市场环境来说，虽然企业集聚有

利于中小企业降低成本，共享信息，但是，也不是说，只要企业一集聚起来，就使任何妨碍竞争力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事实上，在这20~30年发展过程中，广东专业镇遇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集群创新的生长机制、地方政府的作用以及职能调整、传统产业的路径与新产业引入关系，产业集群转移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企业分工与合作机制安排、知识产权与模仿机制关系等。同样，广东各级地方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考察这些问题的产生与解决机制，不仅对专业镇未来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且，也为那些刚刚兴起产业集群的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与教训。我们组织这样一套对广东集群研究的学术丛书，就是试图以经济全球化为视角，运用已有的相关理论工具，对实践丰富的广东专业镇的发展过程与走向等内在规律性问题进行理论总结、提炼以及分析，也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当然，这些研究还仅仅是初步的，但是，这是把企业、产业与地区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一项综合性研究，也是区域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联系最紧密的一个领域，是有利于不同学科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因而这项研究是十分有潜力的，我们也会持续地努力探索。

中山大学985工程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负责人

王 珺 教授

2008年1月写于广州康乐园

前 言

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化成长，以及在组织、产权形态上的家族化取向是包括珠三角在内的中国诸多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在这一经济发展过程中，创业精神作为一种必要的支撑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家族企业与创业精神的涌现大大影响着产业集群边界的拓展与经济性质的动态演进；另一方面，产业集群的成长为创业与企业家族化管理效率的改进提供了有力保障与支持。从产业企业层次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与市场主体的竞争力，以及从效能与效率方面深入考察两者的互动成为当今理论界与产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为进一步推进国内外院校、科研机构之间就上述问题的交流与合作，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二期“985工程”产业经济与区域发展社科创新基地、中山大学广东发展研究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与政策教席、中国管理学会创业与中小企业委员会、《经济研究》杂志社、《管理世界》杂志社于2007年4月6日至7日在中山大学联合主办了“产业集群、家族企业与中小企业创业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德国、瑞士、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名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围绕会议主题和相关理论及实践问题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多个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诸多有意义的成果。会议共收到论文80多篇，其中基于数据的经验性研究占了很大比重，研讨的主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集群：经济性质与竞争优势

（一）产业集群的经济性质

一般认为，产业集群虽然有着空间布局上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地理位置上的集聚使企业间交易比零散化、随机性较强的市场交易更加紧密，企业间长期重复的交易与特定区域文化背景下的信任因素也在交易

特性上显示出一定网络性。因此，产业集群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市场与科层组织的混合体，内部的组织行为整合了市场协调与科层协调的多种特征。张曙光从经济性质角度分别讨论了现有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区域经济学理论对产业集群的解释，以及产业集群对各理论提出的挑战，认为一体化大企业和集群化企业网络是产业和经济发展的两个作用相似而逻辑相反的过程，提示了一体化与分体化是获取和实施规模经济的两种不同方式，说明了产业集群发展的区域不仅是一个产业分布的地理空间，而且是一个人们群居的群落空间。徐海洁和叶庆祥则从嵌入性角度考察了产业集群存在的社会基础。

（二）产业集群的演进与创新

在现实中，集群在“组织”形式与内容上表现出了高度的丰富性，这事实上是与集群产生的基础与所处的阶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进可以从网络的强度与动态性两个纬度来进行考察。集群的出现受到偶然条件、经济与社会条件的制约，在集群形成后，被动外部性会不断强化这种集群化趋势，为它进一步在网络基础上动态的成长提供了启动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集群是一种连续的组织类型，它既有着静态的一面，也有着动态的特征；既有着松散网络下市场原子企业特性，也有着高度网络下产业区的特性。围绕这一相关议题，与会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企业聚集基础上，蔡绍洪等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进将经历企业群落、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等几个阶段。现有的各类地域化聚集经济现象，尽管其产生的原因、背景、表现形态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是处于这一演进历程的某一个阶段或过渡阶段上。他们进一步指出，并非在任何区域都能形成企业群落，也并非所有的企业群落都能顺利演化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各种产业集群也并非最终都能够演进升级为区域创新网络，其演进过程主要受到集群内自组织协同机制能否得到有效发挥的影响。类似地，芦彩梅等从复杂系统理论的角度出发，指出产业集群演化的基本方式是自组织和他组织，而演化的根本动力是集群成员间的合作竞争和协同进化。从分类学的另一角度，王缉慈等考察了工业集群、创新集群与创意集群的区别，结合实例分析了全球背景下中国沿海地区工业集群的形成和最新发展动态，指出沿海工业集群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利用当地资源进行离岸外包的结果，它具有与创新性集群不同的本质特征；这类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逐底竞争”和“集群转移”有可能成为其所面临的普通困境和显著特征；我国沿海工业集群正面临诸多方面的挑战，需要在公共政策的扶持和帮助下，尽快实现向创新性集群的转变。

从社会网络角度考察集群的动态演进是集群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纬度。顾慧君从集群中企业的成长需求出发，基于社会网络的结构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融合集群内外发展环境的集群升级的耦合模型，从社会网络结构分析的四个特征指标，即中心度、簇聚度、结构自治度以及结构对等度出发，分析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企业、集群的行为选择及其对集群升级的影响。邬爱其和魏江从创新网络视角出发，对与不同

集群企业相匹配的创新网络模式进行了探讨,指出创新网络对集群企业成功创新的支持作用是情境性的,其中,环境不确定性、企业战略导向、企业吸收能力、企业创新类型是四个重要的情境因素。

此外,史祎馨和张丹松借助演化博弈的分析方法,认为集群升级成功的关键在于集群系统的组成构件——企业,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企业的创新能力、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合作强度,以及企业对于升级决策的风险偏好等因素对集群升级的影响。滕堂伟和曾刚则以张江高科技园区为例,从集群制造到集群创新角度对集群的动态转型进行了案例研究。

(三) 产业集群竞争优势

对集群竞争优势的考察存在地理经济学派、产业组织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等多个视角的考察。传统经济地理视角强调了集聚中的外部性(包括静态外部性与动态外部性)对竞争优势的影响,而产业组织理论在解释竞争优势时则存在市场势力与纵向分解两种主要的竞争性观点,资源基础理论主要从资源动员与创造角度认为资源效率的提升是集群竞争优势的基础。竞争优势的分析也存在区域层面与企业层面的不同。前者分析了集群与非集群在竞争优势上的差异,而后者则主要考察了处于同一集群内部企业间竞争优势的差异。

从质疑集群—互动—创新三者的关系入手,王珺的研究尝试揭开集群与创新关系的黑箱。他认为,集群内企业间的互动与创新的发生是需要支撑条件的,互动能够发生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类似地,互动也不必然带来创新。在此基础上,以技术服务组织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相关理论模型,指出技术服务组织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只提供创新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这种可能性与技术服务组织的适应能力相关。不同创新能力的集群需要技术服务组织提供不同的技术服务职能;不同的互动阶段需要其发生职能的转变。不具备这种适应性,互动就不一定产生创新。

从资源获取与整合角度考察集群竞争优势成为近期研究的一个重点议题。朱彬钰构建了集群企业资源获取、吸收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并通过经验研究,验证了企业外部资源获取能力通过影响企业的吸收能力从而影响技术创新绩效这一逻辑。黄忠平和梁琦研究发现,集群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与学习会使得集群企业的知识逐渐同质化,这就要求部分集群企业能不断跨越集群边界,开展集群之间的学习与合作。他们进一步从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两种不同机制角度对集群企业的学习与创新进行了考察。蔡进兵亦基于知识观,从集群有助于知识的获取角度分析了集群的竞争优势,并对集群有利于知识转移及创造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此外,借助经验研究中的比较分析,Perry从企业类型、经理层对集群预期、集群参与者的联系三个方面概括了集群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Liu和Zhang对湖北产业集群进行了分类考察,并厘清了处于不同产业的集群的角色。任荣伟等对集群中的信任与合作进行实证研究。围绕相关议题,与会学者还对集群创新政策、市场势力、外部性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家族企业：组织行为与竞争优势

（一）家族企业的独特性

在管理革命两权分离的一般理念下，家族企业作为一种普遍的组织形式，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经济体成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关于家族化组织形式与管理行为等独特性的讨论中，李新春从代理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入手，指出家族企业在公司治理与资源管理两个方面具有非家族企业所不具有的优势，基于中国情景，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优势体现在由信任、管理行为、心理所有权所带来的监督控制成本的降低，以及以家族成员作为控制要素的独特性上，而资源管理优势则主要通过评价、获取和整合，以价值创造的形式体现出来。在进一步整合两个理论框架基础上，李新春的研究建立了家族企业独特竞争优势的综合概念模型，指出适当地开放家族股权和控制权结构，降低家族治理程度，加强资源管理优势，是强化家族企业独特性综合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朱沅和何轩从权变角度，考察了关系与契约的不同运用组合是家族企业特性的重要体现。

（二）家族企业治理与绩效

治理形式与运作机制上的独特性是家族企业在绩效上有别于非家族企业的一种重要影响因素。一般认为，家族企业内部的非正式契约能降低信息不对称，促使代理成本降低，提高决策和运营效率。当然，这也不能排除正式治理对于企业的积极作用；相反，随着企业横向与纵向边界的拓展，正式治理在众多已有研究中被认为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关于家族企业绩效的考察，现有研究也关注了不同的侧面，包括企业的战略绩效与财务绩效等。将治理与绩效连接起来考察是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

从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分析入手，陈凌与鲁莉利用浙江省企业的数据库，对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发现家族企业的生产效率高于非家族企业，而家族企业中的裙带关系对生产绩效有显著的损害。此外，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兼任与绩效没有显著相关性，但一把手的人力资本水平对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陈晓红等对金字塔形家族控制模式进行了理论研究，并以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家族控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有侵害其他股东的动机和具体行为，成“系”企业加大了家族控制股东侵害少数股东权益的概率和程度，家族控制企业一致行动人累计股权比例与企业价值呈现一定的U型关系，债务融资没有起到在家族治理中应有的功能，独立董事参与公司治理亦没有起到制度上防止掏空的监督和制约作用。金永红和陈焯借助对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研究发现，家族往往对公司有绝对的控制权，股权制衡作用很难发挥，“隧道行为”可能性增大，而家庭对董事会的控制程度较大，也使独立董事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限制了外部治理机制的作用空间。

从更为微观的角度，贺小刚和李新春对家族的具体控制内容、机制与绩效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家族控制的负面效应高于正面效应，这表现在强化家

族股权的控制将有碍于家族企业的发展，提高家族成员在高层管理团队中的集中度未能显著地改进企业的绩效，家族企业主的授权策略有助于改进企业绩效等方面。周立新和陈凌将家族企业不同的控制权偏好和多元化企业目标纳入融资行为问题的分析之中，实证考察了公司治理与家族企业融资行为之间的基本关系，发现家族控制对企业利润积累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而家族控制对家族企业股权融资可能会产生显著的“U”型影响。此外，姜明伦借助问卷调查考察了浙江民营企业的治理现状，李增泉等人从寻租、化解风险等动机角度，以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考察了企业在建立政府关系努力以及相应的组织结构支持因素。

（三）家族企业继任与成长

高效与顺利的继任是确保家族企业成长的重要基础之一。窦军生和贾生华从个人意愿、家族承诺角度对家族企业传承计划的制订与实施进行了经验研究，发现在传承过程中，董事会尚未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创业企业家仍是传承过程的主导者，子女愿意接班能够推动家族企业对继承人的选择和培训，家族对企业的承诺也有助于家族企业明确传承后的愿景和发展战略。朱素英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了企业的组织特征、前后任的个体性和差异对继任的影响及影响途径，并从前后任企业家的角色互动、继任者的企业家能力和继任后企业的组织特性三个方面来架构企业继任满意度评价体系，发现前任与继任者的人际信任关系、传承共识是企业继任满意度主要的综合性影响因素。顾颖和房路生的经济研究发现，影响继任的因子主要体现在经理人市场、企业主、内部继承人、企业发展状况以及继承人的能力水平等五个方面。

从更微观层面，刘学方等人考察了高管团队内聚力对家族企业继任绩效的影响。在区分社会内聚力和任务内聚力基础上，他们发现社会内聚力维度对家族企业继任绩效的预测力更强，并对客观继承绩效和主观继承绩效有显著的影响；任务内聚力维度只对主观继承绩效有显著影响，对客观继承绩效影响较小。此外，王开盛和栗海燕考察了家族企业选择继承人的三种来源以及现阶段中国家族企业选择代际传承的主要原因：杨在军以及王晓婷和贾生华分别探讨了家族企业中不同性别参与者对企业继任、运营与管理的影响等。

三、中小企业创业：研究焦点与企业行为

（一）创业的研究范畴与焦点

创业研究在最近二十年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创业者特征、创业类型、企业动机与导向、创业过程与创业企业成长等议题上取得了丰富成果。张玉利认为，现有的创业研究已经突破对创业者个性特质的争论，而开始转向学科体系的构建。这体现在关注创业过程、侧重企业生命周期前端的研究，关注创业过程中的独特行为，以及总结独特行为背后的决策方式等方面。他强调在研究中需要关注企业生命周期前端的创业活动并将其与成长联系起来，创业者先前知识和经验影响着新企业的创新性；从行为

层面上看,创业导向强调把握机会而非资源,强调承担风险而非规避风险等行为特征,它似乎更契合于手段导向的非线性过程而非目标导向的线性过程,不同的创业导向强度将影响到新企业的成长和绩效。张书军比较了衍生与裂变创业的异同,并分析了两种创业类型中的资源继承与创新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二) 创业企业中的行为与决策

创业者的行为,主要体现在创业决策中的不同模式与逻辑对机会把握和风险、不确定承担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并进而影响这些创业企业的绩效与成长潜力。Vance 和 Groves 构建了一个系统的创业线性与非线性思维模型,指出线性的思维模式强调了理性、规则,比较适用于在稳定环境下的战略决策,而非线性思维模式则强调了经验、直觉的判断,比较适用于在信息不完备、存在较大不确定情景下的决策。一个优秀的创业者需要在这两种思维模式间实现有效平衡。借助问卷调查,Vance 和 Groves 针对性地对非线性思维模式的内容及其有效性进行了研究。

苗青就规则聚焦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在区分促进型聚焦和预防型聚焦基础上,依据两个纬度高低不同,苗青构建了一个具有四种决策类型的概念模型,并借助经验研究进行了验证,发现因为规则聚焦的不同,创业决策的效标存在较大差异,机会识别与创业决策之间的关系存在紧密性、选择性和偶发性三种关联模式。

四、小结

产业集群、家族企业与企业虽然在分析对象上有所侧重,但它们在组织行为与绩效来源上却存在高度的关联性。新创企业往往是从家族化管理行为入手的,这体现在公司组织结构、股权结构等多个方面,在从创新期向成长期过渡阶段,那些具有浓重家庭化色彩的企业面临着与成熟家族相类似的问题,如资源引进、继任、治理模式优化。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部分地展现出区域集聚现象,这与企业的不断分家、裂变有关,是自下而上地形成的企业家族,也与有意识的行动有关,企业通过贴近同业企业与配套企业,可以获得分散化企业所不能享有的集体效率与集群异质性资源,而集群的拓展与成长也为新创企业孕育了丰富土壤,集群内本地联系的强化也促进了非正式制度的运用,为家庭企业拓展新的天地。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个研究议题是紧密相关的。本次研讨会为上述三个议题提供了一个宏微观的连接,相信中国的经济与管理研究在这个连接基础上能不断产生具有创新性的成果。

内容摘要

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组织形态，产业集群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包括融资活动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企业生产经营环节。现有文献对产业集群的生产系统进行了大量研究，却很少关注产业集群环境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本书在分析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时，引入了集群环境变量，从宏观的制度环境、中观的集群环境和微观的企业自身条件三个方面入手来具体探讨产业集群环境中中小企业的融资机制问题。

中小企业的融资机制是指企业通过何种契约形式，在何种制度规则的约束下开展融资活动。中小企业的融资机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本书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需求—供给”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融资机制变迁的动态过程，揭示了不同状态下的产业集群环境对企业融资机制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广东产业集群发展的案例和实证研究，提出并验证了我国内源型传统产业群中企业融资机制变迁的三阶段假说。

本书认为产业集群中企业的融资机制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业集群内部机制和外部金融市场相互替代，二者的不同组合决定了集群企业融资机制变迁的实际路径。当宏观环境中的金融抑制较为严重，集群企业面临的外部正式金融供给不足的时候，集群内部会发展出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机制来解决企业所遇到的融资瓶颈问题。在集群早期处于封闭状态条件下，集群环境强化了蕴含于个体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效应，扩大了私营企业的非正式融资安排供给的规模；而在集群环境变得更加开放的情况下，强大的集聚外部效应又有利于提高集群企业正式金融供给的效率，降低融资风险，有力地促进了集群内部融资中介组织的制度创新活动，缓解了集群企业在正式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研